

“文明与人民根基的和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命题

季明举

【内容提要】 “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话语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其最根本的诉求是呼吁俄国知识分子走出西方（欧洲）的“思想迷雾”，回归人民真理（根基），实现在人民真理（根基）面前的精神“和解”——这是每个背负着民族使命感的俄国知识分子最终必然要走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所谓精神“和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呼吁中具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涵（“三大和解”）：一是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道德和解；二是新形势下（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来自不同思想派别的俄国知识分子彼此间的握手言和；三是俄罗斯（东方）与文明欧洲（西方）之间摒弃前嫌的宽容与谅解。对“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核心命题的话语论述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建构根基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上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 知识分子与人民 根基主义 人民真理
三大和解

【作者简介】 季明举，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言

根基主义（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中文里通常译成“根基派”或“土壤派”）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思想本土化运动中一个十分醒目的集政论、哲学、宗教、美学、历史学、文化学于一身的民族主义理论派别。作为一股宣称超越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以及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迷雾”，回归俄罗斯人民“根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根基主义及其民族文化审美理论”（13BWW032）的阶段性成果。

基”（почва）的民族文化审美思潮，根基主义以1860年《时间》（Время）月刊的创建（“发刊词”的公布）为其作为思想派别正式诞生的标志，以1881年其灵魂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为休止符，先后存续二十余年，其主要的理论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高里耶夫^①和斯特拉霍夫^②。根基主义呼吁俄国知识分子回归人民“根基”（真理），实现在人民“根基”（真理）面前的和解，鼓吹超越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实现本土民族文化复兴。这些论述主要是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自根基主义派别诞生之日起，作为旗手和精神领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分别以《时间》和《时代》（Эпоха）两份月刊以及19世纪70年代的定期政论出版物《作家日记》（Дневник писателя）为理论平台，展开对根基主义的核心俄罗斯命题——“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即“文明与人民根基的和解”问题的全方位根基主义话语论述，进而将根基主义民族文化意识更深刻地植根于崇尚“内在经验即生命信仰哲学”的俄罗斯东正教精神维度之中。本文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60至70年代所完成的若干文学作品、1861~1862年间发表在《时间》和《时代》两份月刊上的“征订启事”，以及1876~1877年和1880~1881年间收录在定期理论出版物《作家日记》中的部分政论文章为案例，分析和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文明与人民根基的和解”）这一核心根基主义命题的话语论述及其历史哲学意义。其中包括俄罗斯人民“根基”（真理）的特殊民族文化指涉，俄国“有教养阶层”即俄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特征，三大“和解”即俄国知识分子实现与人民的道德“和解”、俄国知识分子内部彼此间的握手言和，以及俄罗斯（东方）与文明欧洲（西方）之间摒弃前嫌的宽容与谅解的基本思想内涵，实现三大“和解”的现实路径等四个方面的具体问题。根基主义的最高思想纲领和行动宣言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明与人民根基的和解”这一俄罗斯核心命题的精彩话语论述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由此确立了自己根基主义运动精神领袖和俄罗斯思想奠基人的不朽地位。

^① 格里高里耶夫（Григорьев А. А. 1822 ~ 1864），19世纪中叶俄国浪漫主义美学家、文艺批评家、根基主义运动的思想先驱，“有机批评”（Органическая критика）美学学说的创立者，1860年加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派别，主持《时间》月刊批评栏目，成为根基主义理论“三剑客”之一。

^② 斯特拉霍夫（Страхов Н. Н. 1828 ~ 1896），19世纪下半叶俄国哲学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根基主义理论最年轻的“三剑客”之一，自称是格里高里耶夫“有机批评”学说的思想信徒，以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精彩根基主义阐释而蜚声文坛。

一 “土地与孩子”：迷途的浪子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18世纪彼得改革造成的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间百余年的道德疏离状态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他将彼得改革之后“欧化”的俄国“有教养阶层”即上层知识分子所陷入的道德彷徨描述为一种长期在高空中“漂浮”的无根基状态，即“我们已经漂浮在空中，实际上疏离了根基本身。要知道失去根基就没有生命的成长和果实。而每一个果实都有它自己的根系、气候和营养。没有坚实的根基任何事物向上的运动都是不可能的”^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俄罗斯人民的概念隐喻——“土地”形象。忏悔的主人公常常最后用“亲吻土地”的行为来显示自己向俄罗斯“人民真理”的艰难回归：《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索尼娅劝说下走到泥泞不堪的十字路口，公开向路过的人群下跪忏悔，亲吻被自己的深重犯罪“所玷污了的土地”（VI. C. 405）；《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在佐西马长老的谆谆教诲下，满含热泪地跪下亲吻脚下“寂静的土地”（XIV. C. 328），痛哭流涕地发誓要永远热爱、拥抱脚下这片寂静而广袤的“土地”；《群魔》的主人公沙托夫也呼吁另一位主人公斯塔夫罗金“亲吻土地并为她涕泪交加吧！请求她的原谅吧！”（X. C. 202）。“土地”形象，以及犯下深重罪孽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公开向“土地”忏悔，亲吻脚下“土地”的行为多次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俄罗斯“人民真理”（根基）的隐喻，体现着作家对精英知识分子回归人民真理的艺术性把握。因此像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承认自己的深重罪孽和道德迷途，并公开亲吻“被玷污”的“土地”就成为实现在人民真理面前的和解所必须要履行的一个步骤了。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时间〉杂志征订启事》（Объявление о подписке на журнал "Время" на 1861 год）中所说，“人民早在170年前就诚实地躲开了彼得的改革，从那个时起一直与知识阶层脱离，而知识阶层则过着自己独立的生活”（XVIII. C. 35）。所以，被人们称作“打开通往欧洲的窗户”的“彼得改革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它把我们跟人民分开了。人民从一开始就拒绝了它。改革给人民所留下的那种新

^①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Том 20. Л. Наука. 1972 ~ 1990. С. 148. 文中以下出自该全集各卷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只标出卷数及引文页码，不再予以单独另注。

的生活形式，不符合他们的精神，不合乎他们的标准，对他们不适宜。他们把这一疾风暴雨式的强制性改革称作是普鲁士式的，把这位沙皇的追随者叫做外国人。人民与上层精英社会、与其首领和引路者在精神上分离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当年为新生活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XVIII. C. 36）。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俄国所付出的所有“昂贵的代价”都是肇始于与俄罗斯土地的生命疏离，肇始于失去了“根基”的养分，肇始于自我道德独立性的丧失。下层普通俄罗斯人民对“欧化”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冷漠、疏远甚至敌意都是因为人民在这些所谓的“有教养阶层”身上已经几乎辨认不出自己的道德面孔，人民把他们称作是和与自己道德准则格格不入的“德国人”（XVIII. C. 36）。

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土地”以深刻的宗教涵义。他在1876年《作家日记》第2章的续前部分中还特别注意到，俄语中“基督教”（христианство）和“农民”（крестьянство，即“受洗的人”）不仅发音相似，而且文化涵义相同，说“俄罗斯人以基督教民——‘农民’来称呼自己的全部共同性。这绝不仅仅是教会的观点和仪式，这是活生生的情感，它在人民那里已经成为基本的、活生生的力量之一，没有它，一个民族就不会存在。在俄罗斯东正教中甚至根本没有什么神秘主义，而只有那生机勃勃的、健康的、对全人类的爱，只有基督优美的形象。”（XXIII. C. 130）在这里“基督教”、“农民”、“土地”（Земля）三个具有隐喻色彩的概念被视作是寓意俄罗斯民族文化内涵的同义词。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作家日记》的另一篇短文《土地与孩子》（Земля и дети）中提到在俄人民间“至今仍完整保存着一个原则，具体地说，土地对于人民来说就是一切，他们从土地中培育出一切，并且从土地中获取一切。这也就是人类的正常法则。土地里面有一种神圣的东西。俄罗斯人自一开始就无法想象自己可以没有土地。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人民还是照旧没有放弃这个公式的本质。他们不愿要那种没有土地的自由。土地被看得高于一切，是一切的基础，就是说自由、生命、家庭、秩序、教堂——一句话，一切宝贵的东西都来自于土地。正是由于这个公式，他们才一直坚持着诸如村社、土地社这类事物。其中包含着新的美好理想的萌芽。”（XXIII. C. 98 - 99）斯拉夫派的领袖霍米亚科夫甚至把斯拉夫人称作与西方（欧洲）的“征服民族”（如盎格鲁—萨克逊、法兰西、德意志）迥异的特殊“农耕民族”^①。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土地”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如此

^① Хомяков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ом V. М. 1886 - 1906. С. 106.

的崇高与神圣，以至于一旦失去了它，失去与“土地”的有机生命联系，他们就会变成像小说《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那样的虚无主义者，成为处于漂浮状态的俄罗斯“迷途的浪子”。

亲吻“土地”，重建与“土地”的紧密纽带和生命联系——这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名《普希金演说》（Пушкинская речь, 1880）中针对“知识分子与人民”间的道德感情疏离这一问题向俄国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吁：“顺从吧，高傲的人，首先要放下你的傲慢。顺从吧，游手好闲的人，首先要到田野劳动。”这就是按照人民智慧和解决方式，按照人民真理的方式行事：“真理不在你之外，而在你自身；真理不在物中，不在身外，不在海外什么地方，而首先在于完善自我的劳动之中。你要是能够战胜自己，能够使自己顺从——你就会自由，你在任何时候都未曾想象过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由，于是你开始了伟大的事业，使得别人也都变得自由，并且看到幸福，因为你的生活会得到充实，最终你就能理解自己的人民及其神圣的真理。世界和谐不是在茨冈人那里，也不是在任何地方，如果你感到自己首先就配不上它（自由），你愤恨和高傲，你要求生活无偿馈赠你，甚至根本不认为有必要为它付出人代价”（XXVI. C. 139），那你就会永远不知道家在何方，找不到回家的路，就会永远处在迷惘之中。因此忏悔、顺从“土地”的要求，在俄罗斯“土地”面前“和解”，实现向人民真理的道德回归就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彼得改革之后失去“人民性”根基，进而彷徨不定的俄国知识分子所开出的一副“灵丹妙药”。

不过要真正解除俄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彷徨和疑惑，实现知识分子在人民真理面前的“和解”，仅仅凭借文学创作中的“土地”形象和亲吻脚下“土地”行为的“人民性”隐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理论角度认真地回答人民是什么，“有教养阶层”境况如何，人民“真理”（根基）又是什么这样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基于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与苦役犯们交往的长达十年的个人经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夸口说，他的一个“小小的自豪”就是和其他人相比“非常了解俄国人民”，非常熟悉俄国人民的“典型性格”，并感叹俄国人民是“多么好的人民！”（XXVIII-1. C. 173）。在《彼得堡纪事》（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записи, 1847）一文中他赞扬俄国人民身上的宗教性、俄国人民对终极拯救的热烈向往。他说，“俄国人民了解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他们笃信基督，从俄国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渴望亲吻莫斯科显灵者的圣骨。民众成群结队外出到基辅、索罗维茨岛、拉多加

湖、雅典圣山去朝圣。”(XVIII. C. 25) 而每当悼亡节来临的时候,“民间为了送别冬天,在整个无边无际的俄罗斯大地上,到处都在编花环”(XVIII. C. 23),来悼念十字架上罹难的人类救主基督。当然,按照西方派的观点,“人民愚昧无知,没有受过教育”,人民“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不了解“莫斯科圣徒们、圣彼得和圣菲利普的历史”。除了“顿河王”德米特里、喜怒无常的伊凡雷帝和尸骨安放在莫斯科“圣三一”修道院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人民也不大清楚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和王公们。彼得改革过去后的近二百年时间里,俄国人民“不知不觉地在某些方面忘掉了古代,只尊重和崇尚当代,也就是他们首次开始生活的那个时代。”(XVIII. C. 25)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民对历史的一无所知,人民的贫穷、愚昧甚至粗鲁和蛮野并非人民本身的过错,而是因为人民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斯拉夫派那些“有闲者的某些书呆子们”常常充满“对自己祖国古代的赞叹,无所顾忌地向往古代”,谈起俄国历史来如数家珍,但他们也不过是凭借着“虚无缥缈的浪漫主义狂热,书呆子的狂热”去津津乐道那些“已死的文字、过时的思想,古代俄国的一堆乱石头以及对黑暗的古罗斯故土无所顾忌的盲目崇拜。”(XVIII. C. 25) 斯拉夫派对彼得改革之前那些“美学古董”的沉迷,恰好和怀着猎奇心态在俄国旅行的法国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法国人看到彼得堡奇特的欧洲建筑混合体,会感叹“在俄国,一切土生土长的和民族的东西都消失了。俄国人似乎以自己的民族性为耻辱。”(XVIII. C. 24) 因此,俄国的“有教养阶层”不能鄙视人民,更不能责备人民。须知人民身上保持着亘古以来的朴素道德和虔敬信仰,在心灵深处呵护着全体俄罗斯人的“精神之根”。彼得改革虽然造成俄罗斯“有机体”的裂变,但并没有将人民身上的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独立性连根拔起:“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民族性的消失,而是民族性的胜利,这种民族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欧洲影响下轻易毁灭。这个民族完美而健康,真正热爱自己的现代,热爱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能理解这个时代、这样的民族生活,而生命原则对于他们来说则是永存的。”(XVIII. C. 26)

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认为,“彼得改革在俄国创造了自由的行动,如果人民性格中不带有这种自由因素(人民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因素往往会采取天真美好的形式,有时甚至采取喜剧的形式),它就不可能进行”,其表现就是在彼得改革的推进,“不只在彼得堡的沼泽地上,而且在整个俄国。整个俄国都与彼得堡同呼吸,共命运。所有人都亲身感觉到彼得改革方向的力量和成果,所有阶层都

担负着（无论心甘情愿还是被强迫着）实现彼得伟大思想和我们共同事业的使命。因此，每个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现代俄国的一切——工业、商业、科学、文学、教育、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结构——都靠着彼得堡应运而生，只有了它才能够支撑着。”（XVIII. C. 26）可见俄国人民一度忘我地投入并支撑了彼得的改革大业。与之前全盘否认彼得改革的斯拉夫派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彼得改革所呈现出的积极和进步意义：“我们在这一个半世纪的过程中从彼得改革那里得到的是视野的开阔，这在任何民族那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今世界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随着彼得改革的有力推进，我们的眼界开阔了——彼得大帝的全部功绩就在这里。莫斯科罗斯的思想大大开阔了，对它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它的内涵更加丰富了：我们从而能够意识到我们的全部使命，我们在人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XXIII. C. 46）

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彼得改革还使得全体俄国人在与人类各种文明的积极交往中意外地“懂得了自己原来拥有一个珍宝——这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东正教。她是基督真理的维护者，这是真正的真理，是真正的基督圣容。这一圣容在所有别的信仰中和所有其他民族中都已经暗淡无光了。这个珍宝，这个永恒真理，为俄国所专有，按照当时一些优秀俄国人的看法，为他们的良心免除了接受其他文化的必要性”（XXIII. C. 46），使俄国免于步其他民族后尘而走向堕落和俗气。尽管彼得改革导致俄罗斯“有机体”的裂变，导致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疏离，使俄国为此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但人民还是一如既往地持有朴素的东正教信仰。尽管“人民早在170年前就躲开彼得的改革，然而人民与改革分道扬镳后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不止一次显露出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在黑暗中前进，但却顽强地坚持了自己的道路。他们认真思考着自己的处境，试图创造仅属于自己的观点体系，自己的哲学，分化成各种秘密教派，为自己的生活探寻新的出路和新的形式，可是当他们走上新路时，又不可能离开旧的岸边很远，不可能大胆地破釜沉舟。”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精神根基，他们故土难离。陀思妥耶夫斯基断言，在1812年，即彼得改革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反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期间，知识分子与人民曾经有过唯一的一次大联合：“我们看到了人民是如何表现出自己的力量的。我们当时似乎懂得了他们是什么。糟糕的是他们却不了解我们，而且也不理解。”（XVIII. C. 36）在错过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仅有的大联合会之后，人民陷入了更长时期的沉默，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陌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的俄罗斯人民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民。他们都是纯朴虔诚

的正教信徒，时刻心怀对上帝的虔敬，紧紧跟随基督的脚步追求人类终极道德救赎。与此同时，俄国人又不满足、不耐烦人间俗务，充满对立即行动的渴望，酷爱自由幻想且无拘无束，“喜欢温柔的感情以及能够引起感触的一切”。只有俄国人“能够在一切事物中看到那些虚幻的东西，但是一旦克服了邈邈和慵懒，就会义无反顾，忘我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喜爱的事业中且一条路走到黑。”（XVIII. C. 33）当然，俄罗斯人不是没有缺陷，其最大的缺陷就是“愚昧无知，没有受过教育”，对自身的独立性和精神（信仰）优势还缺乏充分的认知，内心的失衡有时会达到狂热的、不可遏制的极端。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特别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实现民族文化精神复兴的根基主义行动纲领：首要的一步就是开展扫盲运动，即在人民中间“加强教育普及，而且无论如何要尽快进行——这就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一切活动的第一步。”（XVIII. C. 37）只有在推进大规模扫盲计划和广泛普及教育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人民才能重新相互认识并进而以东正教“真理”的基础上实现“和解”，弥合彼此间的分歧，并最终完成新时期俄罗斯民族文化意识的重构。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认为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地负有帮助俄国人民大力提升教育水平，汲取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的历史使命。因为除了彼得改革所带来的“有教养阶层”视野的极大开阔之外，更为主要的是，“我们暂时离开人民根基是为了更清醒和更冷静地反过来观察反省自己，这种能力本身就是最大的特殊性：以容忍的态度看待别人，这种能力是大自然对我们最高尚的褒奖。外国人还根本不具备我们这种无限力量。”（XVIII. C. 37）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强调，原本作为俄罗斯完整“有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因彼得大帝改革的“西化”式改革而暂时脱离了人民根基的知识分子，拥有迥异于西方（欧洲）的精神特殊性。如果没有这一与人民相通的精神（信仰）共性，“知识分子与人民”的最终握手言和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 俄国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使命

知识分子概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人民性”论述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身为其中的一员，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交替使用过“我们”、“有教养阶层”、“贵族”、“上流社会”等称呼来描述这一受过良好西方式教育的群体，以区别于俄国几乎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的“普通人民”（宗法农民），但这一

描述与西方文化语境下把知识分子视作某个独立社会阶层和职业团体的理解相去甚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知识分子的描述是一种基于精神和宗教意义上的界定，而非基于社会学、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性或物质性（经济性）论说。在西方（欧洲），团体利益观念、竞争（征服）意识、阶级（阶层）观念一向根深蒂固：黑格尔将国家内部全体人民划分为从事农耕的、从事工商业的和从事思考的三个阶层^①，并显然青睐从事思考的知识阶层。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基佐^②明确宣布“新欧洲直接诞生于社会的阶级斗争”，其斗争根源在于各个社会群体间的征服与被征服^③；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甚至认为，人类历史即“阶级对抗的历史”^④——随着一个阶级被消灭，就必定会诞生另一个新的阶级，如此循环往复”；1848年由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开篇就明确指出“迄今为止一切现存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根基主义理论家完全认同俄国思想界所宣扬的俄罗斯人迥异于欧洲人的“精神特殊性”观念，而且走得更远。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认为在俄罗斯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完全相互对立的概念，即追求精神超越的知识分子理当厌恶资产阶级的铜臭气、俗气和堕落。知识分子在俄国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为俄国根本不存在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的资产阶级集团。1862年3月号的《时间》月刊曾刊发了一篇据推断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自撰写的名为《贵族与土地社》（Дворянство и земство）的文章，论证说“古罗斯时期没有社会阶层划分。人民——即俄罗斯人之间不存在社会阶层上的阻隔”。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前，俄国贵族作为唯一享有统治农奴特权的土地阶层（地主），仅仅具有形成独立阶级的潜在可能性（因为农民作为另一个独立阶级并不存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剥夺了贵族享有的这一特权，农民获得人身自由，从而结束了俄国社会因阶级统治出现阶级分化的潜在可能性，所以贵族在整个俄国历史上从未作为一个独立阶级而存在过。“俄国贵族首先是俄国人，要他们完全消除自己身上的民族特征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贵族中

① Гегель Г.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М. Мысль, 1990. С. 241.

② 基佐（1787～1874），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曾担任法国首相，创立了著名的资产阶级斗争历史学说，1848年的法国革命结束了基佐的政治生涯，是19世纪中期法国资产阶级温和保守派的典型政治代表。

③ Цыгульский В. Ф. Диалектика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Книга семнадцатая. Пермь 2016. С. 255.

④ Там же. С. 120.

⑤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инения. М. 1955. С. 424.

总会有人倾向于以全体俄罗斯人的眼光评判各个社会阶层。这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形成牢固的阶级群体，即便是在历史上最为有利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形成。”因此，历史上俄国贵族的确扮演着主导力量，但不是作为独立阶级，而是作为“人民中间最优秀的世俗精英和教会长老们”扮演着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

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否认资产阶级在俄国形成的可能性，认为“财经贵族”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只可能出现在商业物质主义的西方，因为在那里统治一切的基础是金钱，而在未来的俄国，自贵族实现与人民的紧密结合之日起，就根本不再需要中间势力（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建立在共同精神基础之上的“兄弟般统一”将会把所有俄国人联接为一个有机整体。“如果现在说，俄国居民的一部分必须向另一部分靠近并与之结合在一起，那么这完全没有任何西方理念的意涵，而仅仅是从俄罗斯历史中所获得的对该事实的思想陈述而已。”^①如果贵族地位取决于财产的多少，那么“人民中间那些最优秀的世俗精英和教会长老们”的地位就要让位于那些脑满肠肥的商人了。“那时候教育也就不存在了。每个商人都会说贵族精神的千年延续还抵不上富翁们百万家产的一个零头。人们就会对资本顶礼膜拜：拥有资本，就会变得为所欲为。那就根本不需要教育了，要知道金钱高于一切。”（XXI. C. 270 - 271）

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在俄国，贵族精英知识分子历来是非阶级性、非经济性、非政治性的文化和精神团体，从来都是信仰、荣誉、勇敢、进步等理念的化身，是俄罗斯智慧的化身，是人民道德理想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在俄国千年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组成了共同的，具有高度道德独立性的“我们”、“有教养阶层”、“贵族”和“上流社会”，并与下层人民组成命运共同体即民族“有机体”。仅仅是彼得改革导致了这一“有机体”的暂时分裂，而在历史长河的更久远时间里知识分子和人民一直是作为有机的统一整体而存在的。所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国知识分子在农奴制改革后的新时期，是完全可能通过教育普及等途径重新实现与人民新的结合，重新接续被彼得改革所中断的历史文化血脉的。知识分子也完全可以重新获得人民的理解和信任。要知道，在俄国“贵族”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就意味着“与人民根基的脱离”。与人民根基脱离的仅仅是因道德迷途而屈服于欧洲外来影响，并变成了“俄罗斯的欧洲人”的那一部分人（即便是这些人，比如虚无主义者，也存在着浪子回头的可能性），而非上流社会全体。

^① Время, 1862, № 3, С. 129. См. <http://philolog.petsu.ru/findost/vremja/1862/MARCH/dvorzem.htm>

知识分子与人民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基础（信仰）而注定不会永远分裂下去。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历史的乌托邦理解》（Утопиче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истории. 1876）一文中宣称：“我们——俄国社会的上层，在脱离了俄国人民一个半世纪之后，把这种珍宝（东正教真理）拿给人民，而人民在我们自己对他们的真理开始真的俯首称是之后应该‘sine qua non’（无条件的）接受这种珍宝，否则这两个阶层的大联合就不可能。我们的真正使命就在于此。”（XXIII. C. 46）

在全面回答什么是俄国人民精神，什么是俄国知识分子等关键问题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集中阐释俄国精英知识分子与人民实现道德“和解”的精神基础——人民“根基”（真理）的内涵。何为“根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根基，这就是人民生活的深处，是历史运动中最神秘的方面”，俄罗斯人民自我独特性的全部激情都指向这种“人民生活的深处”，即“包含着俄罗斯民族性之谜”的、纯洁的东正教^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提到东正教是“纯洁”基督真理的最坚定维护者，这是真正的真理，是真正的基督圣容。这一基督圣容如今在所有其他民族中都已经变得暗淡无光了。“这项珍宝，这个永恒的真理，为俄国所专有，由俄罗斯人来维护，按照当时一些最优秀的俄国人的看法，为他们的良心免除了接受其他文化的道德必要性。”（XXIII. C. 46）在彼得改革之后与外来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的交流中，知识分子进一步懂得了自己和西方相比并非一无是处：俄罗斯人拥有东正教这一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独一无二的珍宝”，这是俄罗斯人拥有精神特殊性的最重要标志。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根基主义的宣言（1861年《时间》月刊征订启事）中所说，“我们（知识分子）终于确信我们（俄罗斯人）也是一个单独的民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我们的任务就是为自己创造新的形式。它是自己独有的、根植于我们自己的根基的，从人民的精神和人民的基础之中提取而来。可是，我们回归根基并不是带着失败者的面孔。我们不拒绝过去的合理性。我们懂得彼得改革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通过改革我们明白了我们未来在各民族大家庭中的意义，那就是在知识分子回归人民真理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全人类的统一和兄弟般团结。”（XVIII. C. 36-37）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需要努力回归的“人民的精神和人民的基础”指的就是东正教这一俄罗斯“独一无二的珍宝”。东正教自988年传入

^① [俄] 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上卷），张冰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452页。

俄国后，未曾经历过欧洲国家那样的文艺复兴、近代工业革命以及之后强大的启蒙主义运动，相反却与俄罗斯村社集体主义意识、多神教思想相融合，不仅保持了基督教了正宗性和纯洁性，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基督教的浓厚生命气息。在欧洲商业物质主义、个人主义观念日渐浓厚，基督教意识普遍衰退甚至瓦解的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东正教理念是拯救俄罗斯、欧洲乃至全人类免于各种灾难和不幸的一副“灵丹妙药”。东正教真理不仅关系着俄罗斯的前途和未来，也关系着全人类的命运和福祉，“东正教作为基督信仰的形式，是一切道德与良心的开端，或许也是各种社会力量、科学以及一切其他事物的开端。”（XXI. C. 266）

结 语

在“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即“文明与人民根基的和解”这一核心根基主义命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欧化”的俄国知识分子看作因彼得大帝改革而暂时脱离了人民根基的道德迷途者。但因彼得大帝改革而思想视野大大开阔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因为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基因和共同的精神基础（信仰）而注不会长久地分离下去。在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思想彷徨和紧张的道德探索（在19世纪集中体现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半个多世纪的思想纷争）之后，“文明与人民根基（真理）的和解”，即“彼得大帝改革的追随者们与人民真理的和解便势在必行”，这也是每一个俄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视阈里，“根基”是个具有多维内涵的“文化聚合体”概念：“根基”的宗教意义即信仰、东正教普世真理、基督博爱、神人说；“根基”的伦理学含义即俄罗斯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宗法美德；“根基”的历史哲学意义即俄罗斯弥赛亚主义和全人类使命；“根基”的哲学深度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所紧张探索的“人的秘密”；“根基”概念的美学意义即人类救主基督之大美，文化之美，俄罗斯人的美意识。而“和解”概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论述中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多维涵义的概念：它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涵义（即三大“和解”）：一是精英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和解。知识分子屈尊降身回归到“人民真理”根基。人民教育水平的提升与知识分子的降身皈依须同步展开并最终合二为一，重新恢复俄罗斯“有机体”的精神完整性。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知识分子彼此之间的握手言和：“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西方主义）的一切思想分歧不过是场误会，尽管它在历史上有其历史的必然

性。”(XXVI. C. 147)正如根基主义宣言(1861年《时间》杂志征订启事)中所说,俄国知识分子之间彼此在共同“人民真理”的基础上消除一切历史性误会,“然后大家一起努力,步伐协调一致地走上未来新的宽广的光明大道。不管有任何的牺牲,无论如何也必须实现联合,而且还要力求尽快地实现——这就是我们的宗旨,这就是我们的口号”^①;三是俄罗斯与欧洲(西方)的思想和解:俄罗斯因具有“纯洁”的东正教而相对于欧洲具有巨大精神优势,但东正教普世主义真理却一直向着全人类所有人敞开,俄罗斯凭借追求“全人类兄弟般团结”的东正教普世主义宗教情怀,注定要以宽广的心胸,诚恳、谦卑地服务于全人类普遍拯救的最崇高事业,这是俄罗斯能够与欧洲实现和解的精神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还透过其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伊万·卡拉马佐夫之口表达了最终实现与欧洲的精神和解的强烈愿望:

“我想去一趟欧洲,因为我知道,那里只是墓地,但却是最宝贵的墓地。就是这样。有价值的亡者平静地躺在那里,墓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记载着过去那炽热的生活,记载着他们对自己的功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斗争和自己的科学的热情信念。我预先就知道,我走到那个地方将跪下亲吻那些石头,并在它们面前流泪——那时我将用整个的心灵确信:它早已成为墓地,决不是别的。”(XVI. C. 210)

(责任编辑 聂侯诚)

^①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здат.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Москва. 1987. С. 50.